

处理文化语境的两种重要手段

摘要:作为语篇知识和翻译实践相结合的一项新课题,语篇翻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跨文化的多边交际活动,其实质就是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信息传递。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法和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法是处理文化语境的两种重要手段。

关键词:语篇翻译;文化语境;异化;归化

翻译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实现不同语言的相互转换,它往往以译文的方式表达原文的含义和情态,其实质就是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信息传递。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要实现这一转换是极为复杂的,尤其是针对语篇翻译中的文化语境问题,更需突破许多客观障碍。本文拟从文化移植和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并在总结前人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语篇翻译中的文化语境问题及其相应的处理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如何处理语篇翻译中的文化语境

傅东华曾对于他自己所翻译的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作过一些评论。如他在该作品的“序言”里写道:“译这样的书(指《飘》)与译 classics 究竟两样,如果一定要字真句确地译,恐怕读起来反要沉闷。譬如人名地名,我现在都把它们中国化了,无非要替读者省点力气。……”这里,傅东华所说的“中国化”即翻译中的“归化”手法,他认为不同性质的文本(语篇)可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飘》的处理与其他一些经典名著不一样,用归化法是完全可以的;另外,他又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翻译意图在于方便读者。该译本一出世,立刻在文坛和译界引起不小的争议和轰动。显然,这是由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同时又对来自异域的“新事物”的好奇和敏感造成的。但是如果纯粹按某些人提出的异化法来译,恐怕该译作曲高和寡而无人问津。所以,笔者认为,傅先生对于《飘》的归化译法就解决了一个能否让读者接受的问题,这与奈达后来提出的“读者反应论”如出一辙。换言之,这种译法既合情又合理,因为它迎合了当时广大国民的精神需求。

由此可以引出翻译界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我们该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翻译中的文化语境问题?传统译论就是在直译派和意译派基础上形成的两大对立意见,即“异化”(alienation)与“归化”(adaptation)。无论在我国还是西方,归化与异化之争都有很长的历史。自18世纪中叶起,国外就有人把尊重源语文本的异质成分作为翻译的指导原则,而这种思想在19世纪乃至整个20世纪的西方译论中形成了一股强劲之流。叔本华、施莱尔马赫、洪堡、尼采、歌德、本雅明等把这种传统一直传递到20世纪,纳博科夫则使译文异化到了极点,以致达到字字对译的地步(Schulte & Biguenet, 1992);在我国,虽然早在佛经翻译之初就有文质之辩,但真正出现归化与异化之争乃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如鲁迅与瞿秋白、赵景深和林语堂之间的那场关于直译与意译的笔战,主要是一场句法的归化与异化之争。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关异化和归化的观点也逐渐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前者主张译文要以源语文化或源语语篇为归宿(source -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后者则强调译文应以目的语文化或译文读者为归宿(target -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实际上,笔者认为,对于具体语篇来说,如果考虑到翻译动机、语篇性质以及服务对象(读者)等几个可变因素,以上两种方法都能在其对文化语境的处理过程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因而也都有其存在和应用的实际价值。

二、以直译为基础、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异化法

英美留学生论文专家 世界一流的师资力量 10多年的服务经验

1. 关于异化翻译

异化可以被看作是一定程度上的直译。在文化移植过程中,它倾向于保留某些“异国风情”,也就是要保留引进源语文化的表达方式,同时又要输入一些新的表现手段(郭建中,1998)。异化翻译涉及语言的各个层面与语篇层面,并在这些层面上引入译入语的结构形式:(1)建立在发音基础上的语音层次。如“AIDs”译为“爱滋”,“Benz”译为“奔驰”,“ballet”译作“芭蕾舞”,“cigar”译作“雪茄”,“laser”译成“镭射”等以及汉语中的“功夫”译为“kongfu”,“麻将”译为“mahjong”,“台风”译作“typhoon”等,这种方法在现代英汉互译中(尤其是一些名词)正日趋普遍并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还有,像计算机专用术语里的“internet”、“Window98”、“CPU”、“WPS”等在汉语中的直接表达,以及今年在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译法“SARS”(有些报刊称之为“萨斯”)等都是异化的典型例子。(2)建立在语义基础上的词语层次。如“showing cards”(摊牌)、“chain reaction”(连锁反应)、“cold war”(冷战)、“hot line”(热线)、“dragon boat”(龙舟)、“lose face”(丢脸,失去面子)等等;(3)建立在修辞基础上的句子层次。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富兰克林所说的“Time is money”译为“时间就是金钱”,以及类似的如“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译为“失败是成功之母”,“It looks like crocodile's tears”译作“鳄鱼的眼泪”,以及“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译作“趁热打铁”等也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异化译法。

2. 异化翻译的具体运用

以下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以下简称《红》)部分译文为例,谈谈异化翻译的具体运用。杨、戴对于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处理堪称语篇翻译的典范。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其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里充满了佛教和道教意识,所以此处的“天”应该与佛教中的苍天、老天爷有关而决非基督教中的上帝。表面上只是一字之差,其背后却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改观。杨、戴的译文“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就巧妙地利用了《圣经》中的一句谚语“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这里,杨宪益把上帝“中国化”了,他用“Heaven”替换了其中的“God”,这样既保留了原有的宗教色彩,又确切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蕴,同时,也便于西方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这样的翻译真可谓匠心独具。再看另一段译文:All thing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are born from the dual principle Yin and Yang. So whether good or bad, weird or wonderful, everything that comes into being depends on the favourable or unfavourable influence of these two forces.曹雪芹原著中的“阴”“阳”二字为中国道教文化所特有的内容,然而,英语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所以,为了保持语言原有的文化内涵,只好采用异化的手段——音译,以杨老先生的话说,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又如:“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一句,杨、戴是这样处理的:“You rateful thing! Like a dog that bit Lu Tung - pin — you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这里,如果只译为“Like a dog that bit Lu Tung - pin”,可能会让英美读者觉得茫然而不知所云;但加上后半句“you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含义就清楚多了。英美读者除了能读懂这句话,还能猜到“Like a dog that bit Lu Tung - pin”是中国的一句习语。异化翻译是有条件的。例如,英语人名、地名和少数新出现的名词术语多采用不同程度的异化译法。但笔者发现,在翻译某些名词术语的时候,往往存在着先异化后归化的现象,如“microphone”(麦克风)和“combine”(康拜因)就分别成了现在人们熟知的“扬声器”和“联合收割机”,就连“sofa”也增添了归化因子而成了群众广泛认可的“沙发椅”。异化揭示了事物的深层含义,又再现了源语语篇的表层形式,一方面丰富和完善了译语的表达力,使表达意思的手段更准确,更具多样化;另一方面,它也为我们了解异域文化打开了一条通道。但

是,在引导读者去认识、了解异域文化的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个是否可接受的问题。而且,由于不同地区的社会开放程度不同,人们受教育的状况不同,他们对此也会产生不同的态度。如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不只要要求译文通俗易懂,他们更在乎语言的文化色彩与品位,甚至文学意义。所以,对这些读者来说,“crocodile's tears”的翻译“鳄鱼的眼泪”就远比“猫哭耗子假慈悲”要符合他们的口味。

三、以意译为基础、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归化法

1. 关于归化翻译

归化也是针对译入语而言的,它指用与源语词语有相同的使用频度,但一般都带有某些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源语语篇的一种方法(柯平,1993)。[1]通常的做法是撇开原文的词语和句法,抓住其语用意义,从译语中选取与原文语用意义相同或类似的表达方式而译之。根据奈达提出的“读者反应”论,翻译的重点不在于语言的表达形式而应当是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即接受程度。[2]归化翻译将原文特殊的语言形式转化为通顺地道的译文,充分发挥了译语的优势,使译文在很大程度上贴近了译语读者。[2]一般地说,外族语或通过语言间相互接触或通过翻译融入目的语之后,开始时或许保留译出语的语音和词汇形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便受到目的语或译入语的语音规则、词汇规则与句法规则的支配而逐步归化成为目的语或译入语的一部分。例如上面提到的“扬声器”和“联合收割机”就是如此。早期有人将“economics”译成“叶科诺密”(见严复《〈原富〉译事例言》),后译为“经济学”。其它的例子像“laser”原译为“镭射”,现译为“激光”,“copy”原译为“拷贝”,现译为“复制”等。[3]傅东华对《飘》的“中国化”处理为我国归化译论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而朱光潜的“近似”学说则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我国近似翻译学的基础。傅雷是神似翻译学的杰出代表,“神似”学说是他的创举。1951年他在《高老头·直译本序》中首次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象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于形似而在神似。”翻译学从林语堂的“传神”论和朱光潜的“近似”说,到傅雷的“神似”论,再到钱钟书的“入化”说,可以说有关归化之论已日臻完善。

2. 归化翻译的具体运用

人类具有的生物共性及其文化间的相似和相通性,这是翻译中可以采用归化方法的客观依据。汉语里的许多成语、习语在英语语言里找不到与之一一相对应的说法,但表达不一、内涵一致的情况比比皆是。用归化译法翻译这些成语、惯用语,不仅使读者容易理解,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显得比较地道、生动,尚可产生异曲同工之美妙效果。[4]例如:“One boy is a boy, two boys half a boy, three boys no boy.”译为汉语即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Once bit ten, twice shy.”在汉语中相当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To grow/ spring up like mushrooms”译成中文就是成语“雨后春笋”;“隔墙有耳,窗外岂无人?”(见《水浒》第16回)可译成“Walls have ears, how can one be sure there's no one outside the windows?”;又如上文提到的“Time is money”一句,译成“时间就是金钱”是典型的异化译法,但若从汉语表达的文化因素上考虑,归化译法应该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那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同样,“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既可译为“失败是成功之母”,也可归化为“吃一堑,长一智”。有时候同一对象或事物在源语和译语里会产生类似的联想意义。这是由于中西方民族对世界的体验和观察在许多方面是非常相似的,这也深刻地反映在许多语言的表达上。[5]例如:“胆小如鼠”英译为“pigeon-hearted”或“chicken-hearted”;“水底捞月”英译为“fish in the air”;“A good rat will not injure the grain near its hole”汉译为“兔子不吃窝边草”。也有时候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即使

同一个词,它却有不同联想意义。如“红灯牌”是我国上海某电子厂生产的收音机。“红灯”让中国读者联想到的是吉祥、喜庆,但译成英文“RedLantern”后,英美人联想到的却是“红灯区”。试想,若不考虑文化因素,将这种产品直译后投入英美市场,那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难怪朱光潜在《谈翻译》一文中说:“最难了解和翻译的第一是联想的意义……”。可以说,它带有特殊的情感氛围,其内涵甚深广而微妙,这对文化语境的处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6]像异化翻译一样,归化手段的使用也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譬如说朱生豪先生用归化法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因其通俗易懂而很受国内普通读者的欢迎,但这对莎学者来说却明显不足,[7]因为“他的译本的光洁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不少错误和简单化、中国化的毛病。”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译者既可采取归化法,也可采用异化法。归化翻译可以使译语更好地贴近译文读者,但极度的归化译法则往往抹杀源语特有的风格和艺术、文化方面的特征,从而影响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8]异化后的译文具有“异国情调”,但毕竟由于读者的个性差异,它能否被广泛接受,也有待于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因此,其可接受性也是相对的。[9]

总之,对于具体的语篇翻译,我们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这两种方法往往需要得到高度的统一。[10]作为翻译工作者,我们应在充分综合分析作者意图、翻译目的、语篇类型和读者对象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努力寻找最佳的平衡点,并针对具体问题、具体情况,在可接受性和不可接受性之间选择最佳的表达方式。[11]

参考文献:

- [1]柯平. 释义、归化和回译[J].中国翻译,1993(1).
- [2]杨艳群. 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局限[J].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4).
- [3]程永生.描写交际翻译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 [4]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 [5]杜娟. 翻译中的归化与移植[J].江苏理工大学学报,2000(6).
- [6]顾嘉祖. 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 [7]刘重德.英汉语比较研究[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
- [8]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 [9]周秋琴.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及文化取向[J].湖南大学学报,2000(1).
- [10]朱健平.归化与异化:研究视点的转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
- [11]钱正福. 翻译中的文化特征[J].苏州大学学报,2000(3).